

最初的抗争

彭真在

“文化大革命”前夕

师东兵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最初的抗争

——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

师东兵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00 号

最初的抗争

——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

师东兵 著

责任编辑：杜世伟

封面设计：张志明

责任校对：王洪霞

版式设计：冯 力

出版发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地址：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编：100091 电话：258.2931 258.1868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版次：1993 年 1 月 第 1 版

字数：220 千字

印次：1993 年 1 月 第 1 次

印张：11.5

印数：1—12000 册

书号：ISBN 7-5035-0703-9/K·47

定价：6.00 元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 录

雷厉风行的铁汉子	(1)
彭真“挂帅”	(17)
吴晗听到了批《海瑞罢官》的风声	(26)
山雨欲来	(38)
向毛泽东反映情况	(48)
“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 文章！”	(54)
“姚文元的书，一本也不准订！”	(71)
“应当公平地展开学术讨论”	(77)
有人借风扬沙	(88)
北京的秀才们也行动起来了	(93)
当心，有人告密！	(106)
短兵相接	(114)
“批判的调子越拔越高了！”	(126)
力挽狂澜的巨大努力	(131)
在真理面前	(146)
正直的政治家与两面三刀的政客	(152)
范围扩大了	(165)
“汇报提纲”的产生	(169)
贯彻“汇报提纲”的努力	(181)

“是共产党员就应该照党中央的指示办!” …	(199)
密访彭德怀	(208)
周恩来安排吴晗下乡搞社教	(221)
周恩来找彭真谈话	(239)
倒戈与阴谋	(244)
可笑? 可悲?	(251)
“座谈会纪要”出笼之后	(253)
邓拓身陷困境	(260)
彭真遭到围攻	(271)
血, 总是鲜红的	(288)
附记	
灾祸降临彭真故乡	(300)
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	(356)

雷厉风行的铁汉子

原文化部部长周扬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彭真，称他是“雷厉风行的铁汉子”；另一个是邓小平，说他是“以柔克刚的大帅”。在他看来，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是没有他们俩硬顶，文化战线早就变得一塌糊涂了。

196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今，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这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彭真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他把这个重要批示反复研究了很久，决定照毛泽东的话办：先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那时，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说：“彭真实际上是党的副书记，书记处的工作主要是靠他来抓呢！”彭真却打趣地说：“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集体意志的执行者罢了。”

在调查过程中，彭真听取了很多人的意见，其中包括江青的看法。

江青说：“整个文化战线，几乎是牛鬼蛇神专了我们的政。”

彭真很不以为然，他说：“那不等于把我们的工作都否定了吗？”

江青说：“文化战线上有一批很坏的人，他们是我们的反动派，过去我们太重用他们了。”

彭真皱了眉头，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很好地分析。凡属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搞清楚，老老实实，对就对，错就错，是真理就坚持，是错误就纠正。有些问题并不是原则问题，或者是已经过去的事了，提起来是千斤，放下不过四两，我的意见是大家对这类问题不要老是斤斤计较，死扭着不放，以致妨碍我们的团结和前进。大家要互相了解，互相体谅，互相信任，不要互相猜忌。”

江青给他转来了廖沫沙、吴晗等好几个人的材料，要他查办。彭真都压下来了，他给一些人交待：“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曾经给我们闯了很多乱子，结了很多旧仇夙怨，造成了很多隔阂。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十分小心，认真努力地做好团结工作。对一些人的定性一定要搞准确，不要吹毛求

疵。”

经过他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文化还是艺术战线上，我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好的，是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的。坏人和不好的作品只是极少数。所以，他主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文艺工作者、普通老百姓，都只能服从真理。他到处说：“我们对一个领导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不属于尊重不尊重他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什么不尊重，那就是把尊重庸俗化了。学术界、文艺界也应该这样，有意见就畅所欲言地发表，共同讨论，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一看二帮。”

彭真的这些提法和主张，受到了文艺战线许多人的欢迎和赞赏，也显然被一些人反对，江青就是其中之一。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的文件又作了一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彭真被震动了。

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毛泽东的脉搏了。但是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党的纪律而言，他懂得自己必须维护大局，维护毛泽东的威望，他不得不抽出相当多的精力来抓文化艺术战线的工作。他对文化部和北京市委的一些负责

人说：“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抓一些反映工农兵火热生活的现代戏，要搞现代戏调演。在我们党内，我说我这个是真理，你说你那个是真理，怎么办？怎么行动？我看有一定的组织里面，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少数人可以声明，在行动上服从上级或多数的同时，保留自己的意见。因为真理要受实践检验，自以为是真理，不一定是真理。一切人，不管是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谁都能听出彭真此时说这番话的真正含义。

从1962年以来，江青在文艺上显得十分活跃，也十分神秘。

她经常出奇不意地出现在某个剧场里，事先既不打招呼，也不通知剧院的有关人员。她有时戴着大口罩，捂着脖子，自己亲自买票，连警卫人员也不带，坐在剧场后排看戏，偶而也找几个观众谈话，询问什么。尽管她有意保密什么，但还是有人认出了她，并把她的有些活动向北京市委作了汇报。

彭真并不介意，说：“那是她个人的活动，你们不要大惊小怪。她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紧张什么？”

渐渐传出来了，江青认为戏剧、电影上的问题很大，主要问题分以下几种：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二是宣传错误路线，为反革命分子翻案；三是丑化军队老干部，写男女关系，爱情；四是写中间人物的。至于戏剧上大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更是腐朽透顶。她认为整个文艺界，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污浊的空气。

文艺界的许多人士都担心，江青这么估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会不会有什么背景？会不会再发生什么大的风浪？

彭真不主张文艺工作者背这些沉重的包袱，他说：“江青同志的看法是她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中央，我看也不能代表毛主席。你们还是要认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凡事要看真理如何。”

江青自以为胜券在握，得意地来找彭真，劈头就问：“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重要批示，为什么不见传达啊？”

“我们已经向市委常委和文化部、中宣部的有关领导同志作了传达，今年7月召开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就是贯彻毛主席指示的具体行动。”彭真不紧不慢地说，“对毛主席的指示，必须坚决落实，这是毫不含糊的。”

江青鼻子一哼：“你应该知道，我在北京市内搞京剧革命，可是非常艰难啊！要演员不给，借场地不给，甚至服装、钱都有意刁难。我希望你能给我作主。相比之下，上海市委倒比你们慷慨得多。柯庆施几次对我说：‘你还是到上海来搞京剧改革试验吧，我们这里全力支持你。’”她冲着彭真打了个手势，把嘴撇了几下，“人家可是将了你们的军了。北京的工作不要搞得太被动了，批判那个廖沫沙你们已经被动了，他的《有鬼无害论》是上海组织人马批起来的，你们至今被动得很！”

彭真逐渐感觉到，江青是个十分难对付的女人，她爱虚荣，爱挑剔，稍有不周到之处便会翻脸，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进行讨伐，弄得许多人都不敢接近她。

即使如此，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彭真还是耐着性子和她打哈哈，竭力不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弄僵了。

“我已经对北京市的文艺队伍作了初步调查，正在进行思想和组织方面的整顿。”彭真故意转了话题。

江青显然感了兴趣：“说说你的调查结果。”

当彭真谈完自己的看法后，江青连连摇头：“不！我和你们的调查结果不一样，大不一样！我调查的数字对我来说真是惊心动魄的。根据我的调查，全国的剧团，大约有三千多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另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你说对吗？”

彭真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应付地说：“看来你准备得很仔细，是动了脑筋的。”接着话题一转，说：“今年7月召开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欢迎你参加指导！”

“我当然要参加！”江青临走时，甩下这么一句话。

1964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是江青极为重要的一次亮相。

那天，身着浅蓝丝绸衬衣的江青刚和彭真、周扬等人打

了个照面就说：“今天我想讲几句。”

彭真感觉到了江青的异常。果然，她一开口便语惊四座：

“同志们！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功劳，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江青表情丰富地大讲一番后，话锋一转，板起面孔说，“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个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保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江青讲得滔滔不绝，声色俱厉。但彭真心里却感到好笑：是不是文艺工作者只能写工农兵？难道写历史剧、演传统戏就不是为工农兵服务？难道工农兵只喜爱看表现他们的戏，而根本厌恶历史剧和传统戏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界限没有划清：究竟演历史剧、传统戏等于不等于就是宣传封建主义？如果照江青的逻辑推下去，文艺舞台上岂不是都要扫除得干干净净了吗？如果那样，党还有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可言？

轮到彭真讲话了，他感到了一定的压力。是的，这个问题太敏感，需谨慎，于是他想从正面多阐述一下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和观点。他说：“无论在学术界、文艺界，我们一定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也就是发扬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听了很多人的意见，跟很多人谈了话，才搞出那么一个引言和结论。正面反面的意见都要听，正面反面意见都要允许充分发表，畅所欲言地发表，发表完了，谁的意见正确听谁的，大家都服从真理。”当然，他也反复强调了要大演现代戏，主张搞京剧革命，认为不革命，戏剧就没有出路。

彭真的讲话多少有点言不由衷。

这是彭真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第一次这么力不从心。

彭真并不姓彭，而姓傅，本名叫傅懋恭。1902年，他出生在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垆上村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傅维山，原是山东省新城县人。傅维山十多岁时，家乡遭受旱灾，就跟着父亲，带着弟弟，逃荒到了山西，靠扛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到了18岁那年，傅维山和侯马镇一个名叫魏桂枝的姑娘相爱，不久就结了婚。他们一共生养了3个儿子，5个女儿，傅懋恭排行老大。他的两个弟弟分别是傅懋惠，老三傅懋信。

傅懋恭长到七八岁时，父亲和母亲合计：“咱家祖辈目不识丁，财主们把帐本就是摔到咱眼皮底下，咱也看不懂。说啥也不能让娃们再跟着咱受苦了！”

他俩省吃俭用，把傅懋恭送进本家傅英海办的私塾念书，全家没明没黑地劳动着，供他上学。

年幼的傅懋恭聪慧异常，生性刚直，很令傅英海刮目相看。一次，傅英海随口问道：“你将来想作什么营生？”

“匡扶天下，铲锄不平。”

“什么？你说什么？”

“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瘦小的傅懋恭又说了一遍，闪亮的眼睛盯住了他的先生。

傅英海大吃一惊。他眯缝着眼睛仔细地把面前这位比他小20多岁的本家叔叔——年仅12岁的傅懋恭打量了又打量，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庄稼人求出路，只能跑外作买卖，可这孩子的心思却在水泊梁山！

留心察看，傅懋恭油灯下偷偷看的书就是《水浒》。

“这是反书，看不得呀！”

“地主恶霸为富不仁，当今世界黑暗透顶，穷人不造反哪里有活路？”

“人凭命，虎靠山，世上的穷富是早已注定的。”

“那孟子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又该怎样解释？”

傅英海无言以答，但对傅懋恭却是由爱护到敬佩，教他识字背书，讲解古文更加用心。他暗中对傅维山说：“懋恭办事雷厉风行，浑身上下铮铮铁骨，将来一定能干大事，他心中装得是天下百姓。”

1919年夏天，傅懋恭以侯马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曲沃县第二高等小学。他给自己立字“敬之”，并对傅英海说：“我这个‘之’就是父老百姓，在他们面前我永远要恭恭敬敬，绝不给养活我的这块土地丢脸。”这年，他已经成为17岁的小伙子了。

每天清晨，傅懋恭总是第一个来到学校，教室还没开门，就坐到操场的一块石碾上背书、写字。有一次，语文老师出了个题目叫大家作文，写在黑板上的却是一个大大的“？”号。全班学生瞠目结舌，不知该怎样下笔，傅懋恭却没多久便交了卷子。等到第二天上课，老师把他的文章贴堂公开，让大家观看，只见上面写道：

“纵观天下知识，一言以蔽之就叫‘学问’。不问就不会学，求知必要善问，这个‘问’字实乃有志之士奋发求进的动力也。如今世界，充满了令人难以回答的‘？’，只不过许多人不求甚解，人云亦云，或者不懂装懂，得过且过而已。我求天下理，必带这个‘？’号而思索，只有如此，才能担起改造中国社会之重任……”

由于他勤奋好学，不耻下问，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他成了班里公认的学生领袖。当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到晋南以后，傅懋恭一马当先，带领进步学生上街讲演，宣传打倒列强，振兴中华，还在农村掀起了禁烟、禁赌、禁缠足的活动……

高小毕业以后，傅懋恭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太原省立第一中学。临走的时候，他爹傅维山坐在窑洞的院门口，耷

拉着脑袋大口大口地抽旱烟。那天热焦焦的，太阳把云彩烧得不见踪影，空气仿佛拿根火柴就能点着。他爹子女四五个，本指望老大顶家立业，养儿育女，谁知儿子翅膀刚硬就想飞。母亲魏桂枝一把鼻涕一把泪，给儿诉说持家的艰难。是啊，一家数口过日子尚且难熬，再供他离家 800 里上中学，哪能不忧愁呢！

傅懋恭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早已定下出外闯一闯的决心。但他不愿伤了爹娘的心，便好言请来了几个亲戚好友来给父母讲情摆道理。

“懋恭爹，孩子是个好材料，将来一定有出息，咱受苦一时，可别屈了孩子啊！”

“他大伯，如果你们没钱供懋恭，他的学费我们出！穷人卖了孩子买蒸笼，不蒸馒头争口气，咱们不能让子孙后代都跟着咱受气！”

“就是嘛，树活皮，人活气，我们供懋恭！”

就是俩弟弟，也替哥哥说好话：“爹，就让哥去吧，家里再苦再累，我们俩顶着。只要哥在外面混出个模样来，也替咱傅家光宗耀祖了嘛。”

大家七嘴八舌地劝着、激着。傅维山再也忍不住了，扔掉旱烟袋站起来，拉住儿子的手说：“去吧，爹就是再苦再累也要供你上学，只要你能为傅家争口气！”

傅懋恭到了太原后，同家里的联系越来越少了。头几年他还回家看望几次，后来连信也很少写了。当然，他们不知道，傅懋恭在中学上学时，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改

名为彭真。

1926年，彭真中学毕业后，受党的委派，来到石家庄机器厂，组织工人进行罢工和请愿。国民党下令通缉他，他在工人们的掩护下，又到了天津，担任了天津地下党第三区委书记。1929年6月，由于叛徒的告密，天津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彭真撤出机关时遭到逮捕。

“你是共产党员吗？”

彭真知道叛徒就在眼前，国民党特务机构已经获悉了全部材料，便毅然回答：“不错！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负责天津地区的工作。”

“家住哪里？”

“就在河北，只身一人在外闯荡，家里人都被地主老财弄得家破人亡了，所以才不得不起来造反，起来革命。”

“交出你们党的机密文件！”

“对不起，通通都烧毁了，你们晚了一步。”

彭真凭着机智，沉着地和审讯他的特务巧妙周旋，弄得对手无计可施，只得把他关进天津第三监狱。1931年4月，他又由天津监狱转入北京第二监狱。在狱中，他领导难友多次进行绝食斗争，抗议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为了挽救一个同志的生命，他们往往连续斗争十多个昼夜，不吃饭，不睡觉。

1936年春，在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彭真出了监狱，担任了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1938年，他又到了晋察冀根据地，任根据地的书记处书记。抗日战争